

阳光的垄断

易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阳光的垄断

易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的垄断/易光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2.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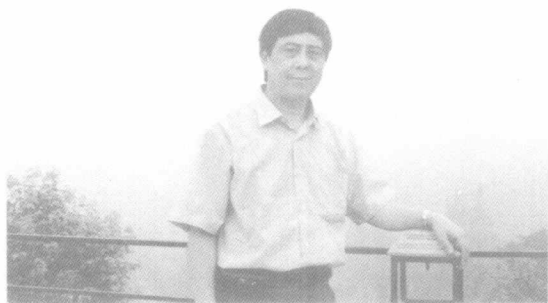
ISBN 7-5059-3988-2

I. 阳... II. 易... III. 理论-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546 号

书 名	阳光的垄断
作 者	易光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阮增宝
责任校对	小 光
责任印制	阮增宝
排版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通信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mm 大 32 开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7.25
版 次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988-2/I·3095
定 价	15.00 元

● 巴渝作家作品集



易光

易光著·阳光的垄断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第 页

作者小传

易发，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多年，做过木匠，当过短暂的乡邮员。1977年考入大学，毕业后在大学讲授写作和当代文学。1980年开始发表小说。80年代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有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四百余万字问世。90年代起主要从事文学批评。1990年出版文学批评论文集《固守与叛离》。获重庆市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重庆市文艺评论奖、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学奖。2012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人迹》。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涪陵师范学院学报》执行主编。

地址：重庆市涪陵区团结路35号

电话：72373135 72374498（传真）

邮编：408003

CQ322603 20 × 15 × 300

目 录

歆享阳光	(1)
——自序	
□ 性别姿态	
诗性写作:叙事的窘迫和对叙事传统的叛离	(7)
人性隐秘的彰显与潜隐	(21)
——铁凝小说近作的层面研究	
从游戏规则到战争规则	(31)
——重读《棉花垛》	
阴影:那扇不曾打开的门	(45)
——读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 成长之旅	
“觉今是而昨非”之后	(57)
——近年“成长小说”漫论	
朝向自身的世界	(75)
——冉冉诗歌创作论	
用文学的光芒灼热自己	(89)
□ 地理空间	
重庆文学史:一种可能性描述	(97)
从开创性研究到文学史建构	(107)

从文学史角度研究杜甫	(111)
秋兰为佩 芳泽杂糅	(114)
——余德庄长篇小说创作论	
趁潮与坚守	(126)
——评阿多小说集《太阳回家》	
流失与回护:尊严的代价	(134)
——评阿多《流失女人的村庄》	
将自己的缰绳抽紧	(141)
——读亚宁小说	
写作:生存的阐释与象征	(148)
——阿霞写作的意义	
快乐的迷失与寻找	(160)
——读阿霞散文近作	
看护诗歌,看护姚彬	(165)
——为姚彬也为诗歌而作	
世纪末与文学期待	(175)
心灵的秘史	(191)
——评第代着冬的《白羽毛的鸟》	
乡村情感:永恒的守望	(196)
——读谭明的两首诗	
关爱生命 寻觅真情	(199)
——李祥品散文简评	
走向开放的乌江文学	(206)
后记	(216)

歆享阳光

——自序

南方多雨，今年尤甚。看看天光晴朗了，那心情也相跟着晴朗起来。雨云却总是不甘寂寞地很快从山根那边赶撵过来，我们称之为“乡下”的这所师范学院的这间宿舍，又重新暗黑起来。每逢此时，就搁了笔，默然对了屋后高而厚布满苔藓和小草的墙，作漫无目标的遐想。

就想到人心。人心的廓朗应该抵达一种什么境界？无欲无求到以一杯清茶相伴半卷残书？心存高远之志或著作等身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或无私奉献小车不倒只管推？人真要细想，再简单不过的事体也要把脑子想出毛病来，人又总是这样不断地折磨自己，直到老死。回想活到这个时候，“不惑”了，而且“知天命”了，却又仍是经常地“有感”而且对“天命”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就疑心古人对人的生命阶段的理性提升，虽然不能说不，却难免有“历史的局限性”。大约那时人的寿数活得短，就加速度地成长着，生产力程度不高，包裹着人的各种物质的诱引就不丰富，活到五十边儿上，就清了心，寡了欲，消停地准备着驾鹤往西边儿去了。这样想

下来,当代人活长了真不是好事情。累,不惟身子累,那脑子也累,只要不是早早地就痴呆了,那脑子不停顿地转着圈算计他人,也算计自己,真还有几分羡慕古人的那种消停与悠闲。再细想,也并非古人都一径儿地悠闲。范进不说了,那是小说中的角色。“知天命”以后还在往“殿试”与“朝考”的道儿上奔的那些诗人那些学者,到了本该离休或“退居二线”的年纪,才被除授个县团级,保不准还是国家级的贫困而僻远之地,又仍是乐颠颠地乘了马车坐了滑杆前往歆享行政级别。想想都累。

这样闲想下来,便想到身边和自身。生活在轻度甚至重度污染的空气里,你不去夹一支烟卷儿不去楼道里用废旧纸片引燃蜂窝煤,鼻腔里也透着黑。这不是为自己不能洁身而自好开脱,只是陈述净化的不易。又时时警醒着需要坚守些什么。人前不装扮笑脸是越来越不行了,大小的学习和交流中也不能“今天天气”地一味敷衍。人后对了自己如果也一脸子媚笑和“吃过没有”地客套,这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人各有各的招数。在我,花一注不小的银子买了“假冒伪劣”,突然闻说近旁也有了“口蹄疫”于是凡成对的蹄子的动物便不再敢将肉入口怕也长出成对的蹄子来,关起房门闷气就要生长出枝枝叶叶时,便翻拣出一卷书压压这火气和闷气。好在尚有闲书近万,触手即是,它们便暂时地充任了“清凉一族”的角色。这是自我调适,很有些从阿Q那里接续下来的“集体无意识”成分,又很管用。这时,便觉得有一缕清丽而温暖的阳光在心里缓缓地升起,荡漾开去,心境渐次平和如镜。

我一直很固执地认为,社会需要各种制度以保证其有序运行,也需要自我调适。自我调适也有多种路径可走,比如最近成为热点的公民道德建设。文学,则是社会自我调适和人的自我调适的重要手段。人又居于重要地位。人从文学中滋养出美、良善、正

义、人道与人性，一如旷野里的鲜花与甘泉，旷野就有了活力，舒张着，滋润着，虽然仍免不了有飞沙和走石，有逡巡其间的狼与豺。套用流行了多年的一种句式，文学不会万能，但这个越来越缺乏理想主义和浪漫激情的时代，需要文学的激活与推动。

90年代中期及之前，我的所谓学术活动主要为两块：女性文学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就前者而言，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那一段，是中国大陆女性（女权）主义活跃而高涨的时期。随着20世纪的结束，人们把目标转向更需要关注的方面。新一代的女性们，对“主义”又不再如王绯们持很痴迷的态度，男性世界的整体反应更是冷漠而浮浅，女界存在问题而又不会成为问题。互联网为“问题女性”提供了宣泄的场所。WTO的走近，为焦虑与沉思提供了新的热点。自己也难免深陷其中，渐次淡了心思，变得愚钝，一如整个社会，失去了对这一领域从宏观的理性的层面发出疑问作出评价的热情和心智。细想下来，其实这不仅是女界的悲哀。想象力和心智的大面积萎缩，已使我们感到莫可奈何。女性作家们的作为，就尤为让人肃然起敬。面对收录不多的几篇文字，除了汗颜，只好假以新的时日。

地域文化与文学这一块，竟也与女性文学研究颇多相似之处。之前对乌江文学与乌江作家群关注较多，无论宏观微观，自认是首倡者与推动者。90年代中期以后，这块地域的文学有小小的阵歇，我的关注与研究也有了短暂的阵歇。90年代末，因为职业关系（讲授当代文学以及编辑高校学报），学术视界也有小小的转移，即开始关注大重庆的文学，并倡导对重庆文学作整体的、系统的、深入的研究。这仍然属于地域文化与文学范畴。自己所得虽然不多，但以自己主编的学报，对重庆学界对重庆文学史已投入了较多的热情和足够的关注。一个证据，便是重庆市的“九五”社会科学研

究规划课题中,一下子入选“重庆文学史”和“20 世纪重庆文学”两项。这让关心重庆文学繁荣的作家和学者们很是高兴。在我看来,只要引出这样的结果,自己是否有所著述,都是值得的,也算功德一件。可喜的是,无论乌江文学,还是重庆文学,都有复苏的新的迹象。虽然文学批评不应只对文学创作发出机械的回应,毕竟,文学创作对文学批评的激励,是一种客观存在。

还在 90 年代中期,便在有女性文学和地域文化与文学之外另辟蹊径之意。于是便有了对“成长小说”的瞩目。但是因为职业加疏懒,所得甚少,而兴趣却仍在。比如,除了贺奕王静怡叶弥辈,甚至曾动心思想对韩寒也投去一瞥。

拉杂说下来,是近年成果虽不多,但对文学的那份感觉(好感)却仍在,甚至偏执到似乎越来越浓。“虽九死而不悔”,人执迷不悟到这一步,是很容易让人觉出有些不正常的。不过,我也无须故做英雄状。我曾经一再说过,我的对文学的痴迷,一多半是为了自己。是补偿。是为坚守提供一种底气。一如这个季节。每当天气晴和开来,便要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让那和煦温馨的阳光扑跃而进,让这斗室充溢清新而自然的光明。如果因了自己的这份痴迷而让身边的朋友非朋友们也有所触动,进而获得补偿和坚守,便是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了。同这个世界的人们一起共享文学的阳光,当是人难得的一种运气。

2002.6.18 涪陵师范学院



性別姿態

叙事的窘迫和对叙事传统的叛离

诗性写作并非女性写作特有的现象。至少在 80 年代相当长一段时期,小说的诗化、散文化几成时尚。老作家如孙犁、汪曾祺,中青年作家如阿城、何立伟等,都曾创作过一些淡化人物情节,刻意营造气氛,充满浓郁诗情的优秀小说作品。但读者和评论界多将之视做对一种文体风格的追求,对小说多元化的一种必要补充,而无法上升到艺术立场和文化立场的根本转变。

当读者和评论家把眼光投注到特别是新时期女性写作时,他们才发现,真正称得上诗性写作的,甚至不是一般的女性写作,而只存于以林白、陈染、海男等为代表的所谓女性个人化写作之中。简言之,诗性写作已成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一大鲜明特征。

梳理近来评论界对诗性写作的研究,我们发现,评论界目前做得更多的,是对表现在女性个人化写作中的诗性写作,作意在彰显这一特征的现象学研究,解剖具体的小说文本,分析这些小说文本的艺术结构、语言运作方式,及文本与女性独特生存经验的关系等。这些开拓性研究,对总结女性个人化写作以推动女性文学的

繁荣,意义重大。

诗性写作无疑是女性个人化写作的一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立即就可以成为女性个人化写作的一大优势。从普泛的层面看,它表现出来的是女性写作中文学叙事的严重匮乏。

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叙事文学创作,在叙事策略的选择上一直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女性主义文化启蒙使女性作家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叙事的文化觉醒。她们不愿意生活在由男性建造起来的叙事传统的阴影之中。四五十年代以来(二三十年代是个少有的例外,虽然那时仍处在女性意识觉醒的阶段)女性叙事文学对男性叙事话语的模仿和复制,使觉醒了的女性作家“难对满面羞”。娜拉式的出走又使她们面临新的惶惑:出走决绝而必要,然而何处是归程?窘迫无计的一部分女性作家不得不暂时地收敛起自己的文化立场,万般无奈地以“旧瓶”(男性叙事传统)来装“新酒”(女性生存经验)。即使是象张洁、张辛欣这样的文化观念新进的女性作家,也难逃这一文化厄运。张洁的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沉重的翅膀》自不待言,即使是非常女性化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因其涉足精神之恋而轰动一时),也并未形成独特的女性叙事话语。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最后的停泊地》,也是在传统叙事框架之内,传达女性的欲望和体验。这甚至造成对“女性文学”的误解和误读。仅仅着眼于内容上的观念的革新,是男性作家也能胜任的。刘慧英在其著作《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中,便将男性作家有关女性问题的作品,也划入“女性文学”之中。另一方面,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叙事话语,进而形成自己的叙事传统,又远不能一蹴而就,从理论到实践,都需假以时日,长期摸索。也是出于万般无奈的窘迫,诗性写作(甚至很皮相地)便成为另一些女性作家唯一的选择。套用现成的术语,这是一种“勉强的解决”。

作为一种“勉强的解决”的诗性写作,其实有它很深厚的文化根基。由于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原因,女性叙事文学在漫长的文学史之流中,一直是“空白之页”。这个空白,是由诗歌写作来作勉强的填充的。说是一种“勉强的填充”,不仅表现在量的多寡上,还反映在质的高下上。哀怨和取媚之作,充斥于传统女性诗歌写作之中。这种从形式到内容的诗歌传统,作为“集体无意识”,影响和制约着一代又一代女性作家。稍作统计和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从概率看,在女性作家中,从诗歌、散文起步,然后转入小说创作的比率甚大。林白、陈染、海男便是如此。以小说作为早期实验文体而又独具风格的女性作家,微乎其微。我们能够举出的,只有胡辛等不多的几位。从表象看,会归结到女性的多愁善感,感觉细腻等生理心理特征,深层动因则来自女性作家对抒情性文体的向往和自信,对叙事性文体的畏惧和拒斥。80年代女性诗歌(甚至散文)成为一道眩目的风景,便是一例。甚至有人断言,真正意义的女性写作,当是以表现女性意识(特别是性意识)觉醒的女性诗歌的出现。一些完全转向小说创作的女性作家(海男、陈染、林白等)仍然拥有一份“恋诗情结”,也是一个佐证。

这样,从文学叙事的角度,不管女性作家们是否愿意承认,残酷的现实是,即使当红的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和毕淑敏,也仍然难免继续生活在男性叙事传统的巨大阴影之下。她们得以与主流叙事文学相抗衡的,不在叙事话语的建构,更多的是在叙事对象的选择上。王安忆的长篇近作《长恨歌》,其反映和表现的女性历史宿命是完全女性化的,但作为文体上所显示出来的特点,最多只是“母辈”作家(茹志鹃的《百合花》、杨沫的《青春之歌》)叙事风格的延续和拓展而已。那种俯瞰和君临式的叙事结构,带有鲜明的男性叙事印记。至于铁凝,则因《秀色》等晚近作品的主流叙事特

征而标志其在经由《麦秸垛》和《棉花垛》形成的女性书写上大大后退。方方、池莉、毕淑敏等人，更是从来没有划入纯粹意义的女性写作一类。其原因自然主要不在类似方方的《埋伏》这类作品，基本上不将目光投射到女性生活，而在她们创作叙事话语骨子里的“雄性化”。

承认这一现实，意在为建构女性叙事话语，创造必要前提。事实上，以林白、陈染、海男为代表的诗性写作，正在作艰苦的革命性努力。

经由诗性写作建构属于女性自己的叙事话语系统，是由对文学叙事传统的叛离开始的。

文学叙事传统，是男权文化的表征之一。它与男权文化一样地源远流长，树大根深，难以摇撼。人们习惯将文学（小说）的叙事上溯到穴居人时代。可以推想，当打猎归来的男人们围着篝火讲述他们的经历时，女人们很有可能处于一种“在场的缺席”的尴尬境地。叙事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勇武、冒险的雄性色彩。演绎到后来，它的宏阔、完整、严谨、波澜起伏等等，既为再现男性经验、历史所必需，又理所当然成为男性文化的隐喻和象征。它代表着男性群体对世界和生活的包容、控制与操纵。高屋建瓴、视野开阔、全知全能的叙事，是它基本的性质和风格。前面提到的那种诗化、散文化式的叙事，完全可以认作是男性“雌化”之后的产物。它之所以历来叨陪末座，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难以见容于男权文化。人们在习惯上会将其视做“荏弱”和“柔媚”，而“荏弱”和“柔媚”正是女性极其重要（男性极其需要）的性征。虽然理论上人们正在进行男女双性化（同时具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心理特征）的研究，正如女权主义者以“要成为男女双性化的人，妇女必须在她们的个性中加入男性特征，或者更象男人”为由，批评男女双性